

悼：半世紀常學習、常分享：本地史學家許舒畢業了……*

高添強

許舒這個名字，幼時常從長輩間聽聞。雖感好奇，始終沒有追問詳詢，更沒有想到這個聽來很地道的名字，其實是一位港府英籍官員。一晃眼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筆者開始閱讀香港歷史的書籍和文章，更有幸接觸到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的學報，驚覺自己雖然喜歡歷史且著迷舊事，卻對本地歷史、地區沿革和習俗幾乎一無所知，學報刊載的文章可說啟蒙了筆者對香港史的興趣。當時注意到不少文章都是出自一位叫 James Hayes 的學者。

輾轉數年，筆者驚訝這位 Hayes，原來就是兒時家人提到的許舒。後來更得知，六十年代初當政府要清拆家族的祖村（牛頭角村）時，他曾盡力協助安頓村民，以減低他們失去家園的痛苦。拆村後，許舒仍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和村民保持聯絡（包括筆者的家人）。這原非其職責，卻表現了他對村民的關心。還記得兒時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幅照片，相中人是筆者的叔公和一位個子不高、面上留著小鬍子的外籍人士。當時就暗付，那位外籍人士是誰？為何會與對英語一竅不通的叔公合照？答案自然是許舒。

到了 1992 年，就在香港大學授予他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的聚會上，筆者鼓起勇氣，上前自我介紹，感謝他帶領進入本地史的領域之餘，更感激從前其對家人的幫助。一聽之下，許舒異常興奮，隨即向身邊的朋友訴說一些三十年前的往事。自此許舒成為筆者亦師亦友的忘年交。一年之後，筆者安排了一次許舒和幾位舊牛頭角村村民的聚會，結束後，許舒說他仍清楚記得每一位出席者（I remember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令筆者驚嘆之餘，也反映他著實關心他們。這次聚會，許舒其後在他的回憶錄“Friends and Teachers”（中文書名《三人行必有我師》）也有提及。

許舒博士（Dr. James W. Hayes）從 1990 年起

移居澳洲，不幸於本年 7 月初在悉尼去世，享年 92 歲。他數十年來孜孜不倦研究本地歷史、文化、習俗和社會，成就斐然。如上文所說，筆者對香港史的興趣，便是源自其地區研究文章。從事公職（1956-1988）期間，跟當時一般官員相比，他格外關心市民的福祉，會想方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許舒退休後，每次回港，日程總是排得滿滿。很多相識數十載的本地友人、舊同事和學界的朋友，莫不期盼一聚。其人緣之廣，可見一斑。

許舒 1930 年出生於蘇格蘭，1952 年畢業於倫敦大學，獲歷史（榮譽）學士學位，不久即被徵召入伍。1953 年，他首次踏足香港，不過並不是旅行，而是以陸軍少尉身份被派往韓國參加戰爭。就在前赴戰場途中，在羅湖和上水軍營駐紮六週，為參戰作準備。這段經歷，成為他對香港和東亞歷史終生興趣的催化劑。

退役後，許舒取得歷史碩士學位。1956 年加入英國的殖民地政務官行列（政務官當時仍稱為 cadet officer），之後獲派往香港。輔政司署很快便為他選取了「許舒」這個中文名字。學習粵語一段時間後，於 1957 年出任南區理民官。和今天的南區的概念不同，當時的南區是指將軍澳、清水灣、南西貢及大部分的離島。作為地區專員，理民官的職責涵蓋面廣且要求極高，一方面必須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活，同時亦得尊重他們的傳統。

當時英國管治新界（包括離島）雖然已超過半個世紀，很多鄉村傳統和社會結構卻依然完好無缺地保留下來；相反內地卻因太平天國興起、革命活動、政府政策、抗日戰爭以及政治運動等原故，不少舊有制度和習俗均受到無情的破壞和摧殘。相比之下，五六十年代新界地區的傳統數百年來沒有很大改變，更被西方學者喻為活生生的博物館（“living museum”）。

港府的新界政策是盡可能維持原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傳統。許舒認為，必須先了解村民的日常，才知道如何幫助改善他們的生活。於是在上任的首六個月，走訪了南區幾乎所有的 180 處村落，並為當地做了詳細的紀錄。許舒並未意識到自己的所見所聞，在十多二十年後將會一去不返，而當時的訪問和筆記，也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上世紀五十年代，政府決定在大嶼山石壁興建水塘，需要遷移當地四條村落。許舒發現石壁村早自十五世紀已建成，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於是開始採訪村民，並記錄他們的祖先牌位和牌匾上的銘文，還收集土地所有權契據和家譜，更鼓勵同事參與，很快便構建起有關該村的口述歷史和文獻檔案。這段經歷為日後他的地區研究工作埋下種子；在香港來說，實屬開創性的研究方法。

六十年代，許舒先後在徙置事務處和華民政務司署工作，公務上往往需要直接面對民眾，很清楚明白市民特別是草根階層的困境。在筆者和許舒的交往中，他經常提起當時的情況，即使幾十年後，仍不能忘懷那段艱辛日子，耳聞目睹的點點滴滴。

從 1975 年至 1982 年，許舒擔任荃灣民政專員及市鎮經理（Town Manager，這是當時政府為發展荃灣設立的特別職位，地位高於地區專員）。1977 年，港府宣布將興建地下鐵路，並以荃灣為終站，荃灣即將面臨巨變。為保留村民的舊有生活方式，許舒盡力協助他們遷往附近重建的新村，今天在荃灣和葵涌的新村入口處，仍不難發現由許舒所題的牌坊。

荃灣從五十年代末開始發展為「衛星城市」，直到地鐵工程開展前，尚留下一些舊村落和傳統社區的結構，包括乾隆時期已建立的三棟屋及個別鄉事組織。對歷史沒有興趣的官員來說，工作本來可以很簡單，一律清拆便可，畢竟七十年代的香港，不論政府和民間，對保育並沒有熱切的訴求。要知道中環舊郵政總局及尖沙嘴火車站這兩座被喻為極具特色的建築，都在那一兩年間拆卸。

許舒理解保留重要歷史建築的意義，遂聯同地區領袖積極爭取保留，作為荃灣歷史的見證。政府最後同意保育三棟屋和海壩村（今德華公園

位置）的一座村屋及其旁的義璋陳公祠，前者於 1986 年更成為法定古蹟。十年後，許舒再致力協助保留位於柴灣的羅屋。三棟屋和羅屋其後均成為博物館，述說開埠前鄉民如何胼手胝足，在這裡落地生根的故事。

1987 年，政府嚴格執行公務員須於五十七歲退休的規定，許舒遂從新界政務署署長一職退下，對此他曾表示相當煩惱（“This left me decidedly vexed”），原因是他覺得對新界的工作和責任尚未完成。不過退休後，許舒仍以另一方式服務香港，筆耕不斷，撰寫學術文章和出版專著，為研究香港歷史作出巨大貢獻。

1949 年以前，在很多中西學者眼中，香港只是中國的邊地，不如中國本土（China Proper）那麼能體現出傳統的中國風貌，因此有關香港本土的論述不多。香港研究的序幕是由那些非歷史專業的有識之士拉開的，他們的成果逐漸為香港這一地域的研究確立了地位，為後來的專業學者奠定了基礎，許舒正是這方面的先行者之一。

1960 年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在港復辦（該會原於 1847 年在港成立，1859 年停止活動），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林仰山（Frederick Drake）發表題為《亞洲研究——歷史遺產與任務》（The Study of Asia: A Heritage and a Task）的演講。許舒聽後如沐春風，決心「常學習，常分享」（Learn all the time, and share all the time），這也成為他在其後超過半世紀裡的座右銘。

兩年後，許舒撰寫了首篇和香港有關的學術文章《1898 年新界生活方式》（The Pattern of Lif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1898），並發表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的會刊中，該論文也成為學會轉向本地研究的開山之作。論文發表後，倫敦經濟學院的弗里德曼教授（Maurice Freedman）鼓勵許舒，應多加研究地區特別是新界的歷史。1975 年，許舒以香港六個地區為題的研究獲頒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除自身研究外，能力所及，許舒往往熱心協助和支援中外學者，特別是人類學家進入社區，使他們融入當地以便進行田野考察，更協助這些學者尋找相關檔案。這方面的貢獻在六十年代對香港研

究的發展和延續相當重要，卻鮮為人知。

職務上許舒非常敬業和勤奮，學術上亦以嚴謹和專業的態度從事本地歷史研究。五十多年來他積極參與學會的工作，並於 1967 至 1980 年間出任學會期刊編輯一職，更於 1983 年至 1990 年期間擔任會長。多年來他發表了大量研究文章，主題範圍從地區歷史、中式習慣法、廟宇、祠堂、銘文、華南地區習俗及信仰、宗族組織、語言到裝飾藝術等，洋洋大觀。

退休後，許舒於 1990 年移居澳洲悉尼。直到逝世前不久，仍就香港及華南的不同主題，撰寫專題文章，更出版了多本重要著作，這些都成為本地研究的經典讀物。

為了表彰他對香港的貢獻，1992 年香港大學授予許舒名譽文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亦於 2008 年授其榮譽院士。

正如他的座右銘「常學習，常分享」，許舒一直樂於與他人分享研究心得。對香港特別是新界史地感興趣的人來說，他的文章和專著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讀物。一代又一代的史學者、語言學家、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均曾受益於他，香港研究今天得以百花齊放，許舒的努力功不可沒。

編註：

* 原文刊於 2023 年 8 月 20 日《明報》副刊。本通訊得到《明報》及作者同意在此刊登。



圖 10、1977 年許舒出任荃灣民政專員期間和其他官員商討當地的發展計劃。



圖 11、2004 年筆者攝於許舒的生日晚宴，右方為另一位香港歷史巨人施其樂牧師（Rev. Carl Smith）。